

青未了

随笔

星期三
2015.2.4

齐鲁晚报

A20-A23

“爷爷好”与中年心境的终结

□林少华

【窥海斋】

月历翻到最后一页，再翻就是陈旧的墙纸。2014年只余背影。这意味着，我又要长一岁、老一岁，尽管我那么不愿意老。

不过，让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老的，还真不是日历，而是一个极为日常性的场景、一个极为日常性的瞬间。准确说来，因了那声寒暄。

天短多了，坐校车回来的晚上六点了，天已差不多黑尽。说得文学些，太阳早已隐没，夜幕悄然拉合。宿舍楼梯的灯泡是感应式，要一跺脚或干咳一声才肯闪亮。住在五楼，需要跺五次脚或干咳五声。我懒得做这种傻里傻气的事，默默爬着楼梯。何必呢！不就是天天出入的蜗居吗？又不是迪斯尼的巨大迷宫。

大约爬到三楼拐角平台的时候，右侧房门开了，楼梯灯应声而亮，灯光中忽然听得一声“爷爷好”。抬眼一看，眼前站着两个陌生的小男孩，一个五六岁，一个七八岁。不用说，声音是他俩同时发出来的。起始我未能反应过来，以为“爷爷”指的别人。前后左右环视一圈，确认此时此地只我一个男性成年人——“爷爷”指的是我，他们是向我问的一声“爷爷好”。我吃了一惊。说实话，迄今为止从未被人叫过爷爷。多少年来听的是“叔叔好”，又多少年来听的是“伯伯好”，这“爷爷好”是头一遭。

吃惊之余，倒吸一口凉气。爷爷？我成爷爷了？我怎么就成爷爷了呢？我有爷爷那么老不成？我忘了回一句“小朋友好”，径自爬到五楼自家门口，进门连手提包都没放就一头闯入卫生间。我直勾勾盯视镜中的自己，上上下下仔细查验。非我自作多情，无论怎么查验都不像是“爷爷”。头发染过没几天，闪着乌黑的幽光，既无华盖之虞，又无谢顶前兆，根数全然不少。面色也足够红润，说神采奕奕未免夸张，但远远算不得形容枯槁。皱纹？皱纹倒是爬上眼角若干，可记忆中“叔叔好”时代就已经有了，与年龄基本无关。老人斑？没有没有，哪里会有那玩意儿呢！体重也恰到好处，既不大腹便便，又不瘦骨嶙峋，脊背更无佝偻风险，如窗外那株银杏树一般迎风傲立……如此转忧为喜之间，耳畔又一次响起“爷爷好”！

我离开镜子，颓然走进书房，歪在书橱夹角的小沙发上怅怅发呆。

有人说，女人由中年步入老年的拐点是：聊天时总聊自己的儿女，什么儿子在美国读博士后啦，什么女儿的男朋友“高富帅”啦，眉飞色舞，无尽无休。听的人只好低头玩手机，偶尔随口应一声“是吗”。那么男人的那个拐点呢？有个外国作家说，女人是一天天变老的，男人是一天就变老的。换个说法，对于女人，由

中年过渡到老年是个漫长的阶段；而同样的过渡对于男人却是一天之内、一夜之间。而我，则似乎是一瞬间之间——听到“爷爷好”那一瞬间。是的，我身上有什么在那一瞬间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OFF，“咔嚓”。那个“什么”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了想，较之中年，恐怕更是中年心境。两个小男孩当然无由知晓——永远也不会知晓——他俩在2014年12月下旬的一个入夜时分，在校园一座普通宿舍楼的水泥楼梯拐角，用“爷爷好”三个字将一个男人推入了那个拐点，把他从老年这扇门的此侧推去了彼侧，无情地终结了他的中年心境。

其实，我的中年早已被生理年龄画上了句号。我出生于1952年，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之所以没退，是因为学校当局看我还不到老，令我再冲杀五年，而我也斗志正旺，无暇顾及拐点。加之每天同二十岁上下的男孩女孩打交道，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年轻者年轻。当然，到了我这个年纪，包括父母在内，身边亲人正一年少于一年。可是，较之老，更多让我意识到的，是哀伤与孤独以及随后涌起的悲壮感——自己必须在人生的荒原上坚定地扑向前去，为了他们的爱，为了完成他们的心愿，为了责任和义务。总之，尽管生理年龄已然进入老年，但心境仍在中年流连忘返。

然而，一声“爷爷好”击碎了我的中年心境，而将老年不由分说地推给了我。我知道，这回我是真正地老了！

昆德拉说每个年纪都是不同的生命观察站。也巧，随手翻阅新到的《散文选刊》，发现已有人替我观察好了老年景象：“在某个路口独自徘徊，在寒风吹过的街道蹲坐，在高高的城市阳台上眺望黄昏的鸟群，在教堂的钟声里沉默不语，在光秃秃的枝干下休憩，在废旧的老屋里看别人家中飘出的烁烁灯火，在家门口看儿孙挥手告别的身影……（云贵：《衰老是即将到站的火车》）——那就是我吗？那会是我吗？”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拾麦穗是我童年比较难忘的记忆。那时候，人们普遍比较穷，青黄不接的日子总盼着池塘里蛤蟆开叫，那就意味着麦子快要成熟了。记得那时村里有个人家，男主人在县城当干部，好像他家的麦子总是长势好也熟得早，找人匆匆收割后就回城去了，总是会有些麦穗掉在地里，村民们会去捡麦穗。其实即使小心收割，一样会有一些麦穗落在地里，为吃不饱饭发愁的人总是会想各种办法，去捡拾那些因为主人家忙不过来而遗漏下的麦穗。

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种故意在麦田丢下些麦穗供人捡拾度日的做法，是一种慈善行为。后来，我读《诗经》，在里面发现了这种古风。比如，《小雅·大田》里有这样一句：“彼有遗秉，此有滞

【人生随想】

留点麦穗在地里

□陈心想

穗，伊寡妇之利。”大田就是面积广大的田地。这句诗歌的解释是：那里有遗落的整把的禾，这里有抛洒的谷穗，舍给孤寡寡如家。也就是富人对弱势群体给以慈善救济的举动。

老子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话。大概就是说，上天就有这种“慈善”之道，人有德行用以彰显这种道。这在道义上为富人的慈善行为涂上了上天立法的道德色彩。也许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天道不仅出现在东方，西方也有这样的道德立法。

《圣经》里就有一些地方说了类似的话。比如，在《路得记》里，大财主波阿斯对来地里捡麦穗的外邦女子路得的态度便是例证。在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得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得就在收割麦穗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她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她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吓她。”

在《利未记》里，也有这样一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

从中国古老的《诗经》和西方的《圣经》，我们看到了人类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对慈善事业的“道德立法”。当然，这在佛家来说，也是慈悲菩萨之举，要人们发扬光大的布施精神。

中国有句古话，凡事要留有余地。这种在地里留下些麦穗的慈善行为，也是为自己留些生活的余地。谁也不知道自己人生的命运是如何的走法，而且古语中也有“富不过三代”的箴言。在生意场上，英语中也有“谈判桌上，给别人留点余地”的说法，当年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在回答《财富》记者采访时就引用过这句话。这也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共生道理。人类社会，许多时候不是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而是尽可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这种非零和博弈在现代社

会越来越多。即使面对自然生态也是一样，留有余地才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撒网网眼大些，打猎放过幼鹿，这也是为了平衡的生态环境留有余地。走笔至此，我想起了小时候过春节时，母亲在敬神之后，家人吃饭之前，不管是敬神的馒头、饺子，还是水果之类，总是要撤下一点，扔到院里，嘴里祷告着。那扔掉的一点，说是给神仙们吃的，实际上在院子里就会被小鸟或者鸡鸭等吃掉。还有二月二龙抬头那天早上围仓，拿出玉米或者谷子撒在地上，围成一个圆圈，这些谷类也会被小鸟或者鸡鸭等吃掉。即使在那样的贫困年代也是如此。这个远古遗风里是否也有着“留点麦穗在地里”的意蕴呢？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多“用具”还是多“用脑”

□刘天放

【社会观察】

作为教师，我总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学习条件变好了，反而不少学生学的东西不如过去的学生扎实了？这除了与大家不断声讨的“应试教育”有很大关系外，是不是与越来越多教师的简单化教学以及学生的简单化学习有关呢？换句话说，除了其他已知的原因，是不是与教师过度使用辅助教学设施或学生过多使用学习用具，使“用脑”越来越较少地参与教学和学习过程有一定关系呢？

比如学外语。都言称现如今合格的翻译越来越来少，供人欣赏的翻译佳作多出自过去的翻译家之手。以前的翻译大家如傅雷、林语堂、叶君健、朱生豪、杨宪益、朱光潜、萧乾、沙博理、罗念生等有很多，且人家还不止精通一门外语。在后人看来，其成就简直无法逾越。可想一想，这些大家在当时学习外语时，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他们当年仅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学习，别说现在孩子们手里的那些复读机、学习机、翻译机乃至互联网移动手机，这些大家当年连一台笨重的台式录音机都没有。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初，大学一个班的学生如果能上一堂有录音机辅助教学的课，都算是一种奢望。

而以上诸大家哪个不是数门外语兼通、功底扎实、博览群书、中西贯通，同时具有大家风范？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南联大，就有中西博学的“牛人”教师连讲义都没有。为何？因为他们扎实的知识功底令他们上课根本不用教案或讲义。许多老师出口成章，学生记笔记一学期下来，即是一本教科书！他们靠什么？在没有

多少辅助教学手段的年代，为什么有如此多大家？

简单地讲，除了这些大家刻苦用功和具有聪颖的头脑外，更重要的恐怕是他们没有那么多学习辅助工具的干扰，不依赖辅助工具，全凭自己的用脑、用心、动手、动口等来完成学习过程。这些大家的头脑里储存的知识，可不是仅靠辅助学习用具“辅助”来的，而是靠超人的毅力一点点积累的。

反观现在的学生，他们生长在信息年代。电子产品对他们来说就像过去孩子们玩踢毽子或跳绳那样普通。孩子们就这样有意无意地被束缚在了学习辅助工具上。时代进步了，辅助教学仪器和设备也先进了，按说教学效果也该变好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孩子们的功课似乎不扎实了，教师们也没有摆脱“辅助教学用具”的束缚。辅助教学用具的过度使用有时候甚至替代了教师的正常且无可替代的讲解：“辅助”教学用具反倒成了喧宾夺主的“主讲工具”。教育界为了搞“创新”，不停地创造“新概念”：自主学习，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等等，不一而足。有些学校甚至规定：教师必须在机器上授课，必须做PPT；学生必须在电脑前完成规定的学习量。殊不知，有些课程是根本不需要多少机器“辅助”的（有些科目的确需要）。

本来，运用辅助教学手段无可非议，可无论怎样，机器终究无法代替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勤奋和学习动力，离开了用脑、用心、动手、动口等“原始”学习方式去学习，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偷懒行为、逃避行为；对教师来说，即是一种浮夸行

为、取巧行为。如今，学生不再多用思考的方式，而是频繁使用学习机、翻译机、复读机、手机……就一切搞掂。教师较少通过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亲身传授去讲课了，带动学生们去用脑思考的过程也简单化了。教学内容中厚重的文化内涵，对字词和背景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挖掘等，也朝着简单化趋势发展。如果这样，除了能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些所谓的“便利”和“省时”，除了给教师和学校带来一些所谓的“创新”教学法和“教学成果”外，有多少实际效果实在很难说清楚。本人有幸听过一堂主要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外语课。只见授课教师围着电脑转圈，一会儿开启视频，一会儿讲解荧屏上的要点，一会儿又忙三迭四地复述上面的内容，忙得满头大汗。下面的学生也是一脸茫然，紧跟讲课的快速节奏，别说记笔记，就连跟得上听讲都成了问题。我没看出这堂课的重点在哪里、知识在哪里，记忆中好像只是把那些该放在屏幕的内容都放上了而已，仅仅做到了“不缺项”而已，更像是在“堆砌”授课内容，而不是讲授。

“辅助学习用具”就是一把双刃剑。“用脑”和“用具”不是对立的。辅助学习用具不是不可以用，但要怎么看怎么用。需要时就用，不需要时就不用。用好了，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如果滥用，就有可能帮倒忙。教师的“教”是根本，而辅助教学设施只能是“辅助”。教育界该对此做些反思。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